



熊彼德在經濟學上

在本刊上期（10月號），我曾發表了「熊彼德青年時代的學術成就」一文。對他當時在經濟學上的造詣略作敘述。在該文中，我還指出，在熊彼德的心目中，以一個學者論，對他最關重要的歲月是在二、三十歲之間。因為他認為一個學者如能在學識上有所貢獻，就在於這「創作活力旺盛的神聖的十年」。在該文中，我接著又說，「我們也許不接受他這種論斷，但就他自己的情形論則確是如此。」現在我們不妨進而看看他的情形又如何正是如此。

他在三十歲以後所完成的主要著作有下列三部，這三部都可以說他早年所提出之基本架構中所引伸出來的：一為「經濟景氣循環」(Business Cycles, 1939)，一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一為「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1954)。在這三部著作中，前二部都是篇幅浩瀚，都超過一千多頁，第三部最為簡短，但亦有四百多頁。據他夫人所說，這是他在「需要消遣」(sought relaxation)時所寫成的。（見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Allen & Union, London, 1954, P.V.）。

從他從事這些著作所消耗的心血

看來，我們當可知他對於自己所要進行的科學研究工作是非常認真的。同時我們也可看出他在三十歲以後所要做的，就是如何繼續他早年所完成的著作而使之更臻於成熟。因此，他首先就要從理論上與實證上將其「經濟發展理論」一書加以修正與補充，結果乃於1926年有第二版的刊行。接著要做的就有二事：一為建立一種貨幣理論，一為分析經濟景氣循環的現象。因為根據他的看法，經濟發展的基本現象是企業家的創新，而使創新成為事實的則有賴銀行信用的創造。這樣就須有一種動態的貨幣理論，對之加以解釋。在另一方面，他認為創新所肇致的經濟發展必引起經濟景氣的循環變動，所以也須對於經濟循環的過程做一理論的歷史的與統計的分析。這就正如他自己所說，要利用他過去所提出的分析的「架構」(scaffolding)來建立起一棟「房屋」。（見其所著Business Cycle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39, P.V.）所以，他接著就開始從事貨幣的研究。但正在這一時段，凱恩斯(J .M .Keynes)卻於1930年出版他的「貨幣論」(A Treatise of Money)。這使他感到被人捷足先登了，但仍繼續研究下去，終於不能寫出一本使自己滿意

的建樹

的著作，而於1935年就放棄這一企圖，轉而從事經濟景氣循環之演進的研究，最後乃有「經濟景氣循環」一書於1939年刊出。但是，這時又遇到凱恩斯於1936年出版其「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掀起了經濟學界一場熱烈的所謂凱恩斯革命。他這部鉅著也終於被這股洶湧的革命浪潮所掩蓋，而沒有受到所應受到的重視。不待言，這不能不使熊彼德感到相當的失望。但是，儘管如此，從經濟歷史的觀點看來，他的這部鉅作還是有其地位的。因為他所採的是從理論、歷史與統計三方面來分析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這種手法是獨特的。現在我們可就此略加發揮。

首先要指出的是所有熊彼德所寫的著作實際上都呈現出一種統一的整體的特性，這種特性無疑的是出於熊氏自己所說的「意景」(Vision)。所謂意景就是一個人對於各種事物或現象在沒有將之加以分析以前所持有的看法（prean-alytic view of things—見其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P.41-42）也就是我所譯的「意」想中的「景」象。具體地說，這種意景的產生必須先對一些所要分析的事象加以體察，然後對

於這些事象的相關性與重要性加以判斷，這種體察與判斷就稱為「意景」。熊彼德認為所有經濟學家都受這種意景所驅策，所有經濟學上的鉅著都是從這種意景以及著者的分析技巧而產生的。他自己的意景是非常廣博的，其中不但包括經濟學，而且也包括社會學、歷史與政治學。唯其如此，他在哈佛大學時同仁將一本為紀念他逝去而作的論文集就命名為「社會科學家熊彼德」(Schumpeter, Social Scientist, edited by S. E. Harris, Harvard Press, 1951)。

熊彼德這種意景的形成是受當時在德奧二國出現的一種特殊的經濟學之影響的，這種經濟學稱為「社會經濟學」(德文為Sozialokonomik，熊氏將之英譯為social economics，有時則譯為economics或scientific economics)，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提出的。他希望以此一名號來代替政治經濟學，後一名號當時在德國也與在其他各國一樣已不很流行了。韋伯之所以要為經濟學提出這樣一個新的名號，是鑒於當時德奧二國經過一場熱烈的「研究方法論戰」以後，已將經濟學人為此分裂成二種科學，一為孟格(Menger)的理論經濟學或抽象經濟學，另一為斯摩勤爾

施建生

